

「滿洲他者」 寓言網絡中的新朝鮮人形象：
以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為中心

柳書琴

The New Image of the Korean in the Allegorical Network of
Manchurian Others: Shu Chiun's *Children without Their Homeland*

Liu Shu-Chi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cultural identities of people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presence of non-Chinese others played a crucial role.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n-Chinese others took place with unprecedentedly high frequenc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State of Manchuria. The founding as well as the decline of the State of Manchuria, as an abnormal national system situated between the contradictory identities of being a puppet regime in the zone of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being a colony at the same time, were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China,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ocie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among the north-eastern. Along with the political interaction with non-Chinese others, the Manchurian literary circle, being the cradle of the north-eastern modern literature, was also an important stage where the north-eastern,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 of mutu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various foreign peoples such as the Japanese, the Russian, and the Korean, observed the collective fate of going through the condition of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political turbulence. North Manchurian authors' writings of national allegories were created in an atmosphere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Harbin as a colonial city, the small-scale oriental Paris where north Manchurian authors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their primary activities. How did north Manchurian author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Harbi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observe the various peoples including the Japanese, the Russian, the Korean, and the Jewish situated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State of Manchuria as an atypical pattern of national system and describe non-Chinese

as well as non-Japanese others? In north Manchurian authors' writings, how did certain depicted stereotypical images of "secondary others" exterior to the class of the ruling regime serve as the medium of the figurative usage of metonymy for these authors so as to critique the Japanese as "the primary other"? What kind of structure was formed in the literary articulation against 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maneuvers when the actual ethn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north-eastern and multiple others were presented through the way of image construction? How could the Korean in Manchuria, as a secondary other subordinate to the Japanese manipulation, be endowed with a positive image distinct from their previously shaped stereotype in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ethnic relations among the different peoples in Manchuria? Moreover, how could the new image of the Korean allegorically reflect north Manchurian authors' worries and anxietie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of the north-eastern, now that these authors were burdened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to obser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ethnic fate?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by focusing on Shu Chiun's novel *Children without Their Homeland*, together with some descriptions pertaining to Manchurian others delineated by Shu Chiun's contemporaries of the north-eastern literary circle.

Keywords: State of Manchurian, Harbin City, Korean, north Manchurian authors, Shu Chiun, *Children without Their Homelan* , Xiao Jun,

「滿洲他者」寓言網絡中的新朝鮮人形象： 以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為中心

柳書琴*

前言

在二十世紀前期的東北人文化身份建構中，非中國「他者」的在場有著關鍵的作用。1931年9月瀋陽事變爆發，翌年3月「滿洲國」成立，9月以「獨立國」名義受到日本政府及某些國家承認。在首次經歷的偽國家體制與多種國際勢力角逐下，東北人與「非中國他者」的接觸，在混亂不均衡的情勢中，到達前所未有的高峰。這個介在淪陷區偽政權與殖民地之間的畸形國家體制，其建立與覆亡正與東北資本主義的加速、東北社會的現代化、帝國主義霸權的更迭，處在同一時期。帝國主義引發的殖民社會體制、跨國資本入侵、傳統社會崩解、多元價值衝激及多民族情境，與東北人現代經驗的形成息息相關。文化身份的建構以自他之間的接觸、互動及交互概念化為前提，透過對他者文化、傳統、價值、特性、生活方式與現代處境的區分，進行對自我身份的界定。在現代東北人身份意識的形成過程中，不僅有著關內五四運動、關外封建社會在現代性光譜上提出對照；東北境內中國各民族在危機動盪的「滿洲國」體制下，與日本、俄國、韓國等異民族交互競合的政經社會與文化現實，往往成為另一套重要的價值參照系統。東北現代文學的搖籃——「滿洲文壇」，也正是東北人凝視集體淪亡命運、建構東北人文化身份的重要舞台。

東北現代作家以最早的被侵略及淪亡經驗，開啟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抗日書寫，並締造了某些書寫典範。其中深染左翼思想、參與共黨組織、文風慄悍的北滿作家群，更在1930年代中期陸續亡命上海、北京之後，以「東北流亡作

家」在關內發聲，成為促進中國抗日書寫風潮最重要的群體之一。流亡前以「東方小巴黎」哈爾濱及其附近城鎮為主要活動根據地的北滿作家群，在多種帝國資本介入而早熟的這個殖民地都會裡，經歷著多種異民族接觸經驗。殖民地的書寫裡，往往深藏著國族的寓言。北滿作家如何透過大哈爾濱地區，對滿洲這個「非常態國家」中的日本、俄國、韓人、猶太諸民族進行觀看，如何描繪非中國亦非日本的其餘他者？非政權統治者的「次要他者」，在作品中形成的某些固著形象，如何成為作家批判「主要他者—日本人」的轉喻？透過形象化工程，東北人與複數他者之間的現實民族關係，在文學的反日話語中形成怎樣的構造？「次要他者」中隸屬日本臣民的朝鮮人，如何在文學再現的滿洲諸民族關係中，被賦予有別以往的積極形象？新朝鮮人形象又如何投射出背負民族命運凝視重擔的作家，對於東北人文化身份建構的憂懼與焦灼？本文將以舒群小說〈沒有祖國的孩子〉為主軸，旁及同時代東北文壇中涉及「滿洲他者」的一些描寫，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一、風雲幻變中的北方殖民都市

哈爾濱的興起，有著如黃浦漁村一般的傳奇。它同時也映照著與多國租界、淪陷區上海不遑多讓的半殖民半封建國家的坎坷命運。在東北，即便有著類似歷史經驗，相繼為俄、日南滿洲勢力擴張重鎮的大連，也無法像哈爾濱那樣擁有最為緊張的國際勢力競逐，以及最為頻繁的異民族接觸與國際居民流動。

然而，在「滿洲國」建立以前，即使在哈爾濱，東北其它異民族也很少成為文學書寫的主題。1932年以後，俄國人、朝鮮人、猶太人、波蘭人逐漸進入東北現代文學的描寫視野，不過其頻率及其在作品中發揮的功能或份量，相較於高度曝光、高度議題化的「主要他者」—日本，仍有懸殊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滿洲建國」初期，以哈爾濱為主要舞台的北滿作家群，對於「次要他者」的注目，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潮。此一熱潮隱含的深刻意涵，不僅在於多種類異民族的生活或社會處境成為文學書寫的關注主題，更在於東北人與境內複數他者，即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受到了多角化的重審與剖析。那麼，為何在哈爾濱，為何是建國初期，而不是其餘都市、其它時段，形成如此特殊的時空場景，導致文學領域一時間出現如此繁多勢力、處境不一的「滿洲他者」書寫呢？更何況，北滿作家群對於他者的再現，其眼光與評價是如此的不同以往。

首先，他們除了瞪視主要的入侵者與強權者，對其餘次要外來民族從排斥、漠視轉向觀察之外，也開始打開成見，以國際社會之宏觀角度重新評估複數他者共處於東北社會、相互競爭或交融合作的多樣現實。他們不僅注意到多種民族或民族個體在東北的不同社會位置、權力變化和起落不定的命運與處

境；也關心著背負強者 / 弱者、主流者 / 邊緣人、幸運者 / 不幸者，各種不同際遇的國際居民與中國人之間命運的交叉與互動。這種視野自然與哈爾濱國際都會的特殊城市條件有關。

哈爾濱自登上現代史那一刻起，就是異民族主導開發和發展的一個城市。從東方帝國主義角力的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到全球帝國主義爭鬥高峰的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位於東北亞聯接中、俄、日、朝及歐亞大陸交通樞紐位置的哈爾濱，一直是帝國政治軍事擴張、外資商貿競爭，以及歐、俄、日、鮮異議份子流亡的匯聚之地。1920年以後，中國東三省政府與日本勢力亦逐漸進入，但是俄人主導的多民族社會態勢，基本上一直延續到1931年瀋陽事變爆發前。故而，東北作家對於往來、盤踞、移民、僑居或流亡滿洲這個「非常態國家」中的日本、俄國、朝鮮、猶太及其它少數東歐民族進行觀看時，獨獨是哈爾濱而不是其它東北都市，首先成為他們觀看與再現「滿洲他者」的最佳櫥窗。

其次，也是更為關鍵的是，北滿作家這時期的審視與探討，出自嶄新的眼光，一種國際性的、現代政治的視野。蘊含國際政治敏銳性的這股現實感，則與「滿洲建國」後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日、俄在東北的權力消長與形勢變化，緊密相關。1932年日滿政權的成立，造成東北局勢的空前變化，刺激中、日、俄關係的再次緊繃，以及滿洲帝國主義權力結構的重行洗牌。舉凡中日民族衝突的加劇、日俄北滿利益爭奪的白熱化、美國意圖介入南滿開發卻遭日本拒絕的敏感磋商，無一不激化各種國家衝突、利益重整和民族緊張，形成了一波波暗潮，襲捲「滿洲國」建國後的東北社會。首當其衝的，便是沙俄中國擴張的第一重鎮，蘇聯紅色革命輸出的東北最大據點——哈爾濱。

哈爾濱城市的故事，處處凝縮著帝國主義擴張及競爭的歷史。眾所周知，哈爾濱是隨著鐵路時代到來，而興起的一個十足“現代”城市。不幸的是，這蜿蜒於東北富庶心臟地帶的現代設施，同時也就是帝國主義侵占和掠奪的帶狀租界和大型輸送帶。依據1896年《中俄密約》及《華俄道勝銀行承辦建造東省鐵路合同》，沙俄取得了在中國東北建造和經營中東鐵路的特權。中東鐵路和華俄道勝銀行，從此成為俄國東北經掠的首要機構。中國東清鐵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簡稱中東鐵路或東清鐵路。以東西主幹及南滿支線，橫亘中俄國境，與西伯利亞鐵路相接，1903年7月全線通車，形成聯結亞歐世界交通網的一部份。¹俄國東省鐵路公司在修建過程中，取得鐵路兩側數十公里寬地帶的行政管理權及司法管理權，此即「中東鐵路附屬地」。附屬地沿鐵道迤邐千里，由中東鐵路局總攬界內一切大權，割據範圍超過一般租界規模，成為沙俄在中國的「國中之國」。

¹ 1897年8月以哈爾濱為中心分東、西、南部三線，由六處同時相向施工，包含從俄國赤塔經中國滿洲里、哈爾濱、綏芬河到達海參崴的北線(主幹)，以及從哈爾濱直達旅順的支線(南滿支線)。

位於中東鐵道南北線交會點的哈爾濱，除了1920-31年控制力有限的中國軍閥統治時期之外，經歷了24年左右的俄國占領，14年左右的「滿洲國」統治。俄人的規劃與建設，形塑了哈爾濱都市基本架構。素為東北境內俄僑最多的這個都會，創建最初大範圍圈定人口稀少的鐵路附屬地，以俄都莫斯科模式進行設計。依據北臨松花江，南靠馬家溝的地勢，仿效歐洲田園城市，以聖·尼古拉大教堂為中心，布置六條放射線大道。南崗被設定為鐵路建設管理中心和俄人高級住宅區，為最早繁盛的都心。鐵路修建時由松花江埠頭運輸資材，沿江鐵道、鐵路工廠附近出現工程相關的中國勞工聚居區。1905年哈爾濱開埠後，位於南崗區西北方、北鄰松花江為水陸碼頭的此一道里區，緊接成為哈爾濱經貿中心和外僑聚居區，猶太人社區亦在此形成。位置最南的香坊區是沙俄登陸的落腳點，但1900年義和團事件重創及城市中心持續北移後，發展漸趨遲緩。一般中國居民及難民居住區，位於南崗區北方，被排除在富庶的南崗區及道里區之外，稱為「道外」。²哈爾濱市依此形成由南崗、道里、道外、香坊等，多核城區鬆散組成的形態。外來統治民族與本土民族分隔而居，反映著殖民地差別政治與貧富分離的階層式城區規劃，為哈爾濱都市的主要特徵。而民間對於這些生活條件有著天壤之別的市區，則給予天堂(南崗)、人間(道里、香坊)、地獄(道外)的諺稱。³

十月革命後，俄國於1918-20年間爆發內戰，引發白俄移居潮。不支持共產主義的俄羅斯人，自1917年二月革命時開始大量流出，直到內戰結束後，才告一段落。這些多為前沙俄貴族、富商、地主、中產階級，以及部分哥薩克人的反對派人士，相對於共產黨的「赤俄」，被稱為「白俄」。受到大革命打擊，他們大批逃亡到哈爾濱，中東鐵路附屬地成為白俄份子匯集地。隨著他們的大批湧進，俄人在哈爾濱的房產資本急劇膨脹，1919-1921年間白俄份子的房產投資明顯成長。在1922年底蘇聯正式建立以前，哈爾濱公議會所屬的南崗、道里區房產資本，多為俄人持有。⁴

中國政府藉由十月革命後的新國際情勢進行多次交涉，終於在1920年10月收回中東鐵路附屬地主權，成立東省特別區市政管理局。此時哈爾濱已在沙俄治理的20幾年間，從松花江畔的小漁村，蛻變為俄人主導的東北亞大都會了。奉系軍閥治理時期，俄人在中東鐵路經營及經濟商貿方面的勢力，雖受到俄國國內政治鬥爭及東北其它勢力興起的影響有所削弱，基本上仍維持一定的事業規模及優越地位。滿洲建國後，俄人在哈爾濱的發展終於受到關鍵挑戰。日人

2 參見，孔經緯、朱顯平，《帝俄對哈爾濱一帶的經濟掠奪》(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1刷)，第234-235頁。

3 參見，羅烽小說，〈殘廢人〉文末自注，收於《橫渡》(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8月)，第109頁。

4 同上註，第65-67頁。

除了計畫收購俄人持有的中東鐵路之外，亦積極推動「大哈爾濱都邑計畫」(1932-34年)，策劃哈爾濱都市的日本化，都市基礎設施及交通網，獲得大幅擴充和強化。在俄國創始、日本接手，猶太、歐美等其餘外國資本持續湧入與競爭之下，躋身東北亞現代史舞台的這個北方新興都會，其成長一路受到帝國主義政治及外國資本覆蓋及推動，基本上是一個殖民地都市。

哈爾濱俄人的興衰，有如盈虧表一般，直接反映著東北俄國人總體勢力的強弱。它隨著日本勢力的崛起，大革命後白俄份子的失勢，步步衰退。下滑關鍵首先是1904-05年的日俄戰爭，繼而是1917-22年間的大革命與蘇聯執政，最後則是1932年的偽滿建國。[日俄戰爭](#)後，戰敗的俄國承認日本為朝鮮的保護國，並將[長春](#)大連間鐵路(南滿鐵路)及其附屬權利，讓渡給[日本](#)。1906年11月，日本籌設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次年完成鐵路接收，並強行增築安奉鐵路，透由鴨綠江鐵橋與[朝鮮](#)鐵路接軌，構築滿鮮鐵路網。此後，滿鐵與關東[都督府](#)成為日本[大陸](#)政策推展的兩大基地，南滿為日本勢力範圍。俄國則將敗退勢力撤回長春以北的中東鐵路(北滿鐵路)沿線，以哈爾濱為中心，重新佈局。大革命到蘇聯建國期間，紅俄白俄鬥爭激化，哈爾濱最初為中東鐵路局長及華俄道勝銀行為首的白俄殘餘反對勢力的根據地，但是不久後即為政權逐漸穩定、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的蘇聯政府所掌握。1924年5月張作霖與蘇聯政府簽訂《奉俄協定》後，中東鐵路純係商業性質由兩國共管，白俄份子對中東鐵路的控制終於在該年9月劃下句點。

1931、1932年之後的哈爾濱，白俄羅斯與紅色蘇維埃對峙的高峰早已褪去。此時牽動哈爾濱社會最敏感神經的，是紅白(俄、日)兩大帝國的對決，而北鐵問題則是他們短兵交接的最後戰場。日俄戰爭後躍昇世界強國的日本，渴望握有中東鐵路南北全線的控制權。作為北鐵營運心臟發跡的哈爾濱，一個在俄人手中成長起來的都市，在俄國勢力南抵旅、大的高峰年代，曾是帝俄南侵的後方策源地，隨著日本的勝進，1905年後淪為帝國勢力的前沿。1919年7月蘇聯新政府宣布放棄沙俄以來在華一切侵略特權，中國回收治外法權；1924年北鐵事業進一步縮限於商業範圍。九一八事變後五個月，日軍控制哈爾濱時，蘇聯政府終於面臨了必須對三十多年來擴張陣地之「北鐵」，進行取捨的時刻了。

1932年，日本向蘇聯提出合併南北鐵道。經過數年施壓與談判，終於在1935年3月簽訂讓售協定，由「滿洲國」以1.4億日元之巨款，向蘇聯收購了北滿鐵路。⁵北鐵出售后蘇聯陣地加速縮減，日本統治整個滿洲的新頁被揭開，東北社會的變遷和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更形激烈。長期象徵著俄國東北亞大陸勢力發射地的「光輝南陲」——哈爾濱，在潮起潮落之後成為了日本北向擴張的明珠。

⁵ 參見，蘇崇民，《滿鐵史》(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12月)，第450-452頁。

二、〈沒有祖國的孩子〉：中東鐵路蘇聯學校裡的跨民族友誼

在日本勢力高漲、俄國勢力退落的變動期，都市承載了多種勢力的進退佈局。1930年代前期，哈爾濱彷彿一個潮間帶。

回首現代哈爾濱歷次的最大變動，總能歸結到一個不變的癥結點——那就是中東鐵路牽動的龐大附屬權力及衍生利益的爭奪。如前所述，哈爾濱是俄人在東北亞大陸勢力網絡中哺育出的一個最為閃耀的結點，中東鐵道則是俄國帝國主義縱橫滿洲、經緯東北亞的核心幹道。通路的逐次裁剪，結點的日益萎縮，終使高寒帝國伸向不凍南方的夢幻網絡節節乾枯。若說都市是日俄短兵交接的最後戰場，北鐵則是直接上演帝國主義物換星移悲喜劇的舞台。

30年代初期活動於哈爾濱的北滿作家，棲身在大國爭霸的風雲變色之中。因此，他們筆下各式各樣的哈爾濱故事裡，總是或隱或顯、自覺不自覺地，銘刻了不同「滿洲他者」所掀動的風雨欲來，充滿緊張感的社會現實與對立競逐中，複數他者之間的幽微互動。這時期的哈爾濱故事裡，「北鐵」常被作為代表地標或城市象徵，用來營造這個鐵路城市的現代都會感、異國情調，或突顯多民族交錯、多國資本競爭的複雜社會景觀。

舒群（1913-1989）⁶取材自哈爾濱中、日、俄勢力更迭期個人幼年經驗的小說〈沒有祖國的孩子〉，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篇作品，以動盪年代異國少年間的真摯友誼，彼此間愛國意識的激發及國際主義的啟蒙為主軸。小說架設的時空，正是北鐵讓售前，鄰近哈爾濱的黑龍江省尚志縣，尤以舒群幼年成長的小鎮「一面坡」，為想像的舞台。今日隸屬哈爾濱市的尚志縣，位於松花江支流螞蜒河畔。⁷為農林畜產商貨聚集的水陸交通樞紐，亦是中東鐵路哈爾濱到綏芬河線上的重點站。一面坡及小說中提到的「葦沙河」都是鐵道沿線車站鄉鎮，附近俄人、日人及朝鮮人甚多。⁸

一面坡中央建有一條外國人大街，街裡有日本大煙館、嗎啡鋪、洋行和當舖，周圍散佈著日本、朝鮮、白俄僑民等各種外國團體及勢力興辦的學校。其中有一所為中東鐵路員工學校，時稱「紅俄中學」，附近各站鐵路子弟，都通勤來此上學。⁹故事環繞螞蜒河畔這所學校裡，中俄籍師生與貧困朝鮮少年的一段交往展開。小說剪裁活潑，插入許多跳躍性或補述性的精采片段。透過在蘇聯學校就讀、有著俄式名字的中國少年「里瓦列夫」之眼，以校內校外的人際

⁶ 哈爾濱市人，原名李書堂，另有筆名黑人。

⁷ 主要流域在哈爾濱市延壽縣內，發源後向西流，上游有小說中提及之葦沙河等支流匯入，中游流經尚志里後轉向東北，最後在通河縣注入松花江。

⁸ 迄今附近還分布著魚池朝鮮族鄉、河東朝鮮族鄉等聚落。

⁹ 參見，董興泉，〈舒群和他的第一個老師〉，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三輯，1981年4月，第16頁。

關係及時局變化，折射變動期大哈爾濱地區不同民族分殊的命運。情節起伏多變，緊扣著日本勢力進入後引發的權力變動與社會不安，進行鋪陳。北鐵經營權的階段變化及讓渡，在此不僅是一個潛在背景，更是「故事時間」的標尺，以及推動情節攀向衝突高峰的主要動力。

以極簡約的速筆進行點描的北鐵情節，主要以小說中簡稱「東鐵學校」的校旗來展現。小說中，幾次被輕描淡寫帶到的東鐵校旗，顯示出外國學校的優越地位，以及所屬機構「中東鐵路管理局」的所有權變化。首次的描寫，出現於俄籍學生「果里沙」長期輕蔑、戲弄，導致朝鮮牧童「果里」疏離退怯的場合。當最年長的果瓦列夫尋向校舍後方長草密佈的河濱沼澤，企圖解開果里內心鬱結時，驕縱的果里沙盛氣凌人地朝宿舍頂上的那一指——飄動著的「一半屬於中國，一半屬於蘇聯的」的旗幟，更刺痛了果里內心，加深他的羞憤。第二次描寫到校旗時，為果里刺殺日兵投河獲救，受蘇聯女教師「蘇多瓦」收留，進入東鐵學校就讀之後。果里英勇弑敵的行為洗刷了俄國學生對朝鮮人的歧視，以及加諸在果里身上「高麗老鼠」的蔑稱，獲得老師及同學濟助的他，在冬日裡專注地學習滑冰，成為快樂東鐵學生的一員。第三次描寫的內容為，滿洲建國後，「街頭上滿是“魔鬼”的旗子」，校役奉命製作的新旗面上，蘇聯國旗分毫無差，但是「另一半面卻不再屬於中國的了」，「那全新樣的，在地圖與萬國旗中，我們從來也沒有見過」。第四次，「不久，更有驚人的消息傳來，我們學校的旗子快完全換新樣的了。」，再接著便是東鐵學校的解散，中俄籍師生的各奔東西。隨著時間推進而變化的校旗，隱射中國主權在哈爾濱的喪失，以及俄、日勢力在東北的消長。除了校旗之外，小說中偶一敘及的事變後中國國旗的撤換¹⁰，也從旁點明了旗幟隱喻的淪喪意涵。

如此之外，在國旗和校旗的描寫中，還透露出一些細微訊息。滿洲事變發生時，蘇聯標榜中立。當兵營上方的中國旗在事變後的第八十九天(約莫1931年12月中旬)遭到撤換之際，東鐵學校裡的中俄聯旗依然屹立，此後至少又飄揚了一、兩個寒暑。它顯示了東鐵學校的特殊性質。作為中東鐵路管理局龐大機構之一的東鐵學校，乃為俄僑及東鐵職工子女而設。小說中的中俄學生，住在洋樓校院裡，課後出入俱樂部看電影，過著無憂無慮的優渥生活。東鐵學校及附近雇用牧童飼養白胖乳牛的富裕俄國人家，沿著螞蜒河畔的山坡，築成了富人世界；相對地，學校邊角由破木板夾湊而成、比宿舍裡的垃圾箱還狹小骯髒的「果里」家，宛如地獄。這些點綴性的描寫，除了呈現哈爾濱不同民族及階級間的貧富差距外，也突顯出1920年以後處於中蘇合辦經營之下的北鐵，作為蘇聯在哈爾濱投資之最大國家事業，擁有不容小覷的政經勢力。小說中描寫日軍

¹⁰ 「兵營的軍號響著，望著祖國的旗慢慢地升到旗桿的頂點。無意中，自己覺得好像什麼光榮似的。但是，不過幾天，祖國的旗從旗桿的頂點匆忙地落下來，再起來的，是另樣的旗子了，那是屬於另一個國家的——正是九月十八日後的第八十九天。」引自，中國現代文學館編，《舒群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年1月)，第12頁。

來到一面坡後，占據兵營民宅，欺凌百姓，不分老弱殘疾，強徵村民修築戰壕。東鐵師生到郊山遊玩，巧遇修築壕溝中的果里，不料因此竟連累累里遭監工的日本士兵毆打。當學生們拿出體操木棒，集體作出攻擊式抗議時，日軍對於北鐵機構附屬學生，只是輕蔑一笑，卻不敢冒犯。作為龐大北鐵事業體微小縮影或象徵的東鐵學校，它的旗幟變化，預告著東北主權異主後蘇聯勢力與北鐵集團遭受的挑戰，它與日本勢將出現的對峙周旋，以及不出幾年利權轉移、鍛羽而歸的命運。

大哈爾濱周邊國旗、機關旗的變化，宣告這是中國主權淪喪、俄國勢力退潮的年代。校旗從半中半俄、半日半俄，到即將完全換新，意味著中國主權從中俄聯營的北鐵撤出，以及蘇聯北鐵經營權利的讓售。「王道樂土」、「民族協和」、「天降國度」震天價響的新時代，在哈爾濱政經情勢的變幻裡，作家反諷性地描繪各種各樣的流亡者和撤退潮。北鐵讓售協定中，蘇聯從業人員獲得「滿洲國」方面負擔3000萬元退職金的優渥補償。返國前女教師「蘇多瓦」告訴果里，「你不能跟果里沙去的，將來在高麗的國土上插起你祖國的旗，那是高麗人的責任，那是你的責任！」對異民族無產階級親身實踐著扶助、同情與慈愛的蘇多瓦，臨別前夕義正詞嚴的叮囑裡，依然不忘策勵果里。然而，從此分道揚鑣的少年們，奔向祖國的歷程與際遇，卻是如此不同。蘇聯師生由中東鐵路上飛馳的專車駛向祖國懷抱，在同胞歡迎聲中抵達首都莫斯科，隨後被安排入學。中國少年和朝鮮少年，卻從此踏上流亡的旅程。果瓦列夫唯一仰賴的叔叔，送走奶奶確保其安全再隨後南遷的途中，於通往關內的車軌遭破壞時，失去了信息。沒有庇護者和旅費的他和他企圖保護的果里，一個淪亡了故鄉家人，一個失卻了祖國。兩個孤苦少年躲在火車廂一天一夜後，又藏進塞滿麻袋的貨艙中飄流，任鼠群在頭上竄走。然而。然而，最後迎接飽受波折兩人的，卻是在碼頭上識破里果身份並加以逮捕的另一個異地的——「魔鬼」。

無所不在的「魔鬼」徘徊不去，如幽靈般成為結構全篇主題意識—帝國主義侵略及民族矛盾關係—的隱語，也是關鍵詞。「魔鬼」，是果里對日本兵的暗稱。「我想爸爸在魔鬼的手裡死了，媽媽怕我們再像爸爸一樣，才把我們送出幾千里以外的地方來。誰想到這“魔鬼”又在幾千里以外的地方攔住我們」。¹¹這句告白非但是果里最終命運的預告，也是果里身世的揭曉。原來十歲左右流亡到滿洲，在俄國富人聚落附近，以貧農生活隱姓埋名，與哥哥相依為命的果里，是朝鮮反日革命志士遺孤。父親是領導「成千上萬的工人，到總督府鬧起來」，被逮捕處死的愛國知識份子之一。從父親被槍斃的日子—春天的「櫻花節」，以及遺腹子果里在哈爾濱淪日時的年齡逆推，這個讓正值英年的父親直到爬上處決的囚車時，仍不斷高聲吶喊「……」¹²的事件，也就是1919

¹¹ 參見，《舒群代表作》，第17頁。

¹² 三一運動當時，朝鮮市民跟隨33名獨立運動參與者高喊「獨立萬歲」的口號，示威遊行。運

年震驚國際的「朝鮮三一運動」。

這一段娓娓道來的插敘，剝落了朝鮮少年窮苦卑微的外貌，在貧賤寡言的性格中暗湧著流亡少年忍辱負重的血氣，波動其傲人的志士血統。同時也為稍後兩兄弟忍辱計議、果敢刺殺日兵的事件，作了伏筆。1909年在哈爾濱車站刺殺日本首任首相伊藤博文的朝鮮志士「安重根」，是果瓦列夫所知悉的。安重根(1879-1910)，被處以絞刑前以漢詩明志，詩末反覆呼喚——「萬歲萬歲兮，大韓獨立；萬歲萬歲兮，大韓同胞」。深刻刺激朝野的暗殺事件，促使日本激進派以首相刺殺事件為由，加速併吞朝鮮。在安重根遭處決的同年秋天，從十九世紀後期即受到日本勢力浸透的朝鮮，終於淪為了日本的殖民地。¹³果里奮力揮舞刀刃插入日軍胸口的那一刻，他以具體實踐打開了國破遁走、羞愧抑鬱的情結。一刀而下，切斷懦弱形象，聯結了朝鮮人激越抗日的歷史血潮。

果里只向始終對其抱持關切與同情的果瓦列夫，吐露身世。小說中以「……」暗示的「獨立萬歲」口號，成為穿越時空的吶喊，迴盪在飄零滿洲的朝鮮少年幽微身世的自敘中。果里沙未曾聽聞過「安重根」，更不知曉果里飄零異國、含辱偷生箇中的辛酸艱苦。以貌取人的他，以血統膚色、國家強弱及鬥爭精神評價異民族，果里的「黃種人被殖民者」身分，使他連連受辱。「高麗？在世界上，已經沒有了高麗這國家。」、「高麗人都像老鼠一樣，如果不是，在世界上，怎麼沒有了高麗的國家？」、「殺了，也像殺了老鼠一樣！」、「像果里那樣人，我不喜歡，不願同他做朋友」。¹⁴即使果里還是個孩子，即使在孩子的世界當中，「在滿朝鮮人」因為亡國者的身份，因為是日本帝國附屬階層，便難以分說地背負了沈重的負面形象。不僅國力日益強盛的蘇聯公民如此看待，即使國家淪亡在即、謀食於異國機構底層的一個中國人，亦復如此。當果瓦列夫企圖帶果里進俱樂部看電影時，負責看守的東北大漢拒絕讓「窮高麗棒子」通行，還端出父輩口吻告誡果瓦列夫：「你和他做朋友，有什麼出息？」位居日本殖民統治下，民族地位劣勢而尷尬的朝鮮人，便是如此地處於周遭民族深刻的成見中。

現實貧寒，志節高貴。果里並非老鼠，虎父無犬子。隨著情節的推展，真相的剝出，果里日益顯得沈著內斂，不再動輒為果里沙的言辭而羞愧或激怒，思慮成熟得幾乎「不像個孩子」，形象日益崇高。他的深刻超越了果里沙，高度勝過了「我」。小說最後，日警於港町逮捕兩人的那一刻，果里不畏驚恐，從容承認自己為高麗人，重拾對身為高麗人的驕傲，同時挺身而出，「我是高麗人，他不是的」，反過來成為了比他年長的中國少年的保護者。朝鮮少年，站了出來。這個站起來的少年，正是「少年朝鮮」、「志士朝鮮」、「獨立朝

動快速遍布全韓，朝鮮總督府加以鎮壓，死傷慘重。之後不少獨立運動參與者亡命國外，或採武裝革命方式從事獨立運動，此事也促使日本調整朝鮮治理方針，改行「文治主義」。

¹³ 1910年8月，日本強迫簽訂《日韓合併條約》，10月開始了對朝鮮長達36年的殖民統治。

¹⁴ 參見，《舒群代表作》，第12頁。

鮮」的隱喻。在嚴峻的異國陌生環境中，年幼無依的果里兄弟，從最初的苟且偷生到逐漸忍辱負重，最後捨身取義。奮起的新朝鮮人，贏得了俄國師生的贊許與尊敬，另一方面也啟示、激勵了即將步上淪亡後塵的東北少年，對自身民族命運的凝視與承擔。

三、「替身書寫」中的他者形象、功能及隱喻

被視為左翼文學優秀作品的〈沒有祖國的孩子〉，是舒群東北出走中途創作的處女作、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

舒群1932年3月加入第三國際，9月加入共黨。1932年底到次年秋，被派往洮南擔任第三國際所交通站站長，以《哈爾濱五日畫報》分銷處名義進行掩護，從事情報傳遞工作。在此期間，他與當時哈爾濱進步文藝青年，如金劍嘯、羅烽、白朗、蕭軍、蕭紅、塞克(陳凝秋)等人，建立了深刻情誼。1933年因日本發動長城沿線戰事，對哈爾濱政治控制日嚴，舒群遂於1934年初避走青島。8月在國民黨藍衣社青島左翼逮捕事件中入獄數月，後因未被查出與共黨的直接關係獲釋。1935年抵達上海，在潦倒困頓中被左聯作家發現，推薦加入「左聯」。151936年5月〈沒有祖國的孩子〉在上海獲得初次發表，他生平第一部小說集也以此命名。16這個階段他和蕭軍、蕭紅、羅烽、白朗、端木蕻良、駱賓基……等陸續抵達上海的東北流亡作家，在魯迅和左聯幫助下推出了諸如《八月的鄉村》、《生死場》、《呼蘭河邊》等小說集，對「抗日救亡」產生了不小影響。《沒有祖國的孩子》，也是這脈絡中知名的一本。

〈沒有祖國的孩子〉發表於上海，但構思於哈爾濱，寫作於青島，因此與寫作於上海、抗日書寫較為直露的作品不同，保留著言論尺度受制的「滿洲國」境內文學，特有的激越與隱喻交混的風格。依國旗圖形製作的校旗，以及由果瓦列夫、果里沙、果里分別象徵的性格不同、命運迥異的異國少年，共同組構了小說中的「祖國」隱喻。這裡的「祖國」，包含了蘇聯、中國以及尚在獨立建國途上掙扎的朝鮮民族等，不同形態、階段的「民族國家」。每位少年代表的形象，都是集體性的，民族國家式的。他們的身世是民族現況的縮影，年齡與貧富反映著民族國家成立的先後或有無，彼此的互動模式及人際關係則是東北亞現實或未來國際關係的隱喻。

故事裡，日、俄、中、朝的國家 / 民族關係，呈現由強而弱的明顯階序。

15 上海813事變後，舒群依共黨安排輾轉晉南、武漢、桂林、延安等地，以記事、刊物編輯、報紙主編、話劇編寫等，繼續從事抗日宣傳。參見，里棟、小石，〈舒群傳〉，遼寧社科院文學所、黑龍江社科院文學所編《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二輯，1980年4月，第114-116頁。

16 原載《文學》6卷5號，後收錄於《沒有祖國的孩子》(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9月)，第3-21頁。

日本是這個多國 / 多民族網絡中位居權力頂峰，最為強勝的「主要他者」。掌握新主權君臨北地的它，同時也是威脅其它三者的「共同他者」。不過被稱為「魔鬼」的日本，卻是故事敘事裡特意迴避的一個——最為「隱性」的他者。大至日本的國家名稱、日本人的民族稱謂，小至諸如一面校旗的細節，都被刻意地迴避和淡化。¹⁷間接角度的描寫，隱含了作家的美學考量，掩蔽其不便正面批判日本及其傀儡政權的弱勢位置，以及他們意圖以「書寫的忽略」傳達徹底蔑視的一種態度。

在人物塑造方面，迴避正面書寫的這種技法，成功降低了硬直批判書寫的枯硬感。天真瀟灑的少年友誼，流瀟感性的詩意筆致，開闢出親切自然而具感染性的隱喻空間。與對“主要他者”採取「隱性書寫」同樣微妙的，是對於“中國自我”的輕描淡寫。相較於對“魔鬼”滿腔怨怒躍然紙上的果里，主權淪喪變亂臨頭的果瓦列夫，對於國家民族乃至個人未來的憂戚、對侵略者的負面觀感，卻沒有獲得正面鋪陳。然而「描寫的匱乏」，並不表示自我書寫的缺席。在多角對照的複數民族書寫網絡中，以次要他者批判主要他者，替代滿洲體制中不具足自主性的東北人發言，可以說是這篇小說的策略。

舒群對於由東北人代表的「中國自我」的書寫，採取了間接射擊，一種「替身式書寫」。在「替身式書寫」及其構成的「替身隱喻」中，蘇聯人、朝鮮人的命運勾劃與形象營造，成為主題意識傳達的主要載體。俄人曾是哈爾濱最強大的他者，除了俄羅斯人之外，也帶進不少他種族白人進入東北。以1922-23年為例，哈爾濱及其市郊(不含傅家甸) 126,952的人口中，外國人56,369人，占總人口的44%。蘇聯公民占首位，其中俄羅斯人最多占86.4%，此外是取得俄國籍的其他民族，猶太人10.2%居首，次為波蘭人1.6%，另外尚有總數不及1%的拉脫維亞人、芬蘭人、愛沙尼亞人、日耳曼人，以及未達1%的其餘人種。¹⁸1917年十月革命後，國勢蒸蒸日上的蘇聯；以及1910年淪為殖民地，成為東北亞第一個淪亡國家的朝鮮，在「替身書寫」中成為象徵強弱兩端的對比性喻體。在此構造下，不同少年象徵的「片面化」民族形象，成為隱喻經營上的必要。果里沙，被塑造為天真率直卻充滿偏見，給弱勢民族帶來苦痛的少年。他的盛氣凌人，源自白人種族優越感和強盛國家的自我倚仗。¹⁹那近乎幼稚的性格以及輕蔑他民族的驕慢態度，反映出東北人對於長年活躍中國北地的俄人，貴族式的優越地位及民族歧視的負面觀感。與果里沙代表的利益階層俄人形象成為對比的果里，一開始投現在果里沙眼下的盡是貧窮、卑怯、懦弱、受欺凌

17 相對於中、俄國旗的正面描寫，小說中對於滿洲國五色旗，僅以「萬國旗中從沒有的旗子」進行替代性指稱。

18 參見，《帝俄對哈爾濱一帶的經濟掠奪》，第86頁。

19 「果里沙總是用手筆劃著自己的臉，果里的臉。意思是讓果里看看自己的臉和他的臉，在血統上是多麼不同啊？」，參見《舒群代表作》，第5頁。

者、殖民者走狗等，弱勢者及奴屬民族之不良形象。

在有關蘇聯人、朝鮮人「刻板印象」的描寫中，舒群一方面整理了東北人對於東北他者，以及東北他者彼此之間的刻板印象，一方面則透過觀察複數他者被接受的典型特性與民族互動關係，省思淪亡後東北人(乃至中國人)的未來命運與出路。以蘇聯人、朝鮮人的直接描寫為中心，在網絡化的多民族關係中，原先存在日/華兩造之間，隱而不宣，不欲也不能正面剖陳的東北人的焦慮、怨怒、恐懼、意圖或欲望，各種憂鬱愁結的情緒，一一被作者投射到不同種類替身的塑造裡。它含藏著東北人失落不返的自尊與自信、即將來臨的殖民地處境、國族再興的企盼等等，總括了東北人現代歷史的災厄、寓言與願景。

〈沒有祖國的孩子〉一方面勾劃出表面性、片面化的他者形象，另一方面則企圖從更深層社會現象中，攻擊、搖撼這些「固著化」的民族成見。故而小說中每一個國族/民族的形像，在表相上的集體性、片面性特徵之外，同時又隱微存在著其它分化或流離的變異面。而且這些非主流面向，往往被營造得更為光明動人。譬如，同樣隸屬北鐵職工集團的俄國人裡，有果里沙那樣繼承哈爾濱白俄人不可一世之優越感的少年，卻也有如蘇多瓦那樣不動聲色長期扶持異民族無產階級、濟助抗日異議人士的人物。而朝鮮人果里兄弟，則被設計成日本法令保護的在滿朝鮮人之外的流離者。「滿洲國」與朝鮮僅一衣帶水之隔，當時境內有一百數十萬朝鮮人。最初日本國及其臣民(包含朝鮮、台灣等)享有治外法權，1936年6月為顧及「滿洲國」獨立性以及間島地區朝鮮人法庭管轄權等問題，才加以撤銷。1936年10月，關東軍司令官和朝鮮總督於圖們會談，確立「滿鮮如一」方針，進一步強化滿鮮關係。²⁰隸屬日本臣民的朝鮮人在東北擁有相當數量與享有某些權益，然而浪跡在主要朝鮮人群體之外的這一對孤苦兄弟，既不附屬日滿官方組織，未跟隨日鮮商貿集團，也不是農業移民。離群索居的他們，未仰仗任何日本人或朝鮮人謀生。當時確實有為數極少的此類朝鮮人，隱形於社會邊緣的「無國籍鮮人」，往往生活困頓、立場複雜，成為「滿洲國」意圖透過治安或戶籍系統，加以剪除或收編的不穩份子。²¹

小說中的敘述者「我」，中國少年果瓦列夫，在與不同他者的互動中，從慣性相處到交相比較，最後漸漸加深了對不同民族特性及社會歷史現實的理解。對果里，他從單純的憐憫到深刻的敬重，對果里沙則從包容、勸阻到怒斥。即使同樣針對俄人，儘管他與嚷嚷革命鬥爭口號的果里沙存在堅固友誼，但是對於力行濟弱扶傾之蘇多瓦，卻顯出更多仰望與愛敬。最後，舒群讓果里走向與在滿朝鮮人主要群體截然不同的志士道路，也讓社會主義女教師的光華

²⁰ (日)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譯，《滿洲國史》(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校辦印刷廠，1990年12月)，上冊，第544-545頁。

²¹ 同上註，第67-73頁。

覆蓋貴族習氣的果里沙，藉此傳達他認可的中國奮起之路，描繪暗黑時代中他企盼的一線光明。

在以跨國少年人際關係作為表現的描繪中，里瓦列夫實際經歷的卻是異民族觀感的重新檢視、淪亡後人生走向的抉擇，以及國際主義的啟蒙。東北大地上，長期糾葛於舊有民族利害的關係與成見，能以新理念在新權力結構中獲得調整，開創出新的聯結，形成有效的抗爭勢力嗎？「果里沙」、「果里」這些與「果瓦列夫」²²酷似的名字，隱喻著在非均衡的關係中逐漸磨合形成的「血統」。可以說，果里沙、果里、果瓦列夫，是「異姓(異民族)兄弟」。故事最後志同道合、相互扶助的友誼，使「三個人成了不可離散的群」。每個孩子各自代表的民族國家形象，至此交匯聚合形成了國際主義的總體形象。在即將踏上流亡之途的作家心中，在沒有祖國的孩子前方，彷彿浮現了新的希望國度。

「我」看似一位全然客觀、為旁側寫主角果里喪國之痛的敘事者，但是隨著情節發展，「我」對喪國的體認也從「旁觀」的位置轉為感同身受。作者有意藉「我」(中國人)旁觀果里(高麗人)失去祖國的悲哀，以及他最後起身反抗、捍衛國格的轉變，以為借鏡，對中國讀者傳達呼告和警示。〈沒有祖國的孩子〉以「自我投射」的方式，在蘇聯、朝鮮少年身上對比辨證，傳達弱小民族聯合是淪亡者、被殖民者共同活路的信念。隨著日偽政權的建立，東北人的可見命運，若非流離，便是接受統治。流亡？奴屬？再不，還有其它選擇嗎？從多角化的跨民族結盟裡，從民族成見的打破中，舒群的間接書寫與相關思考，深刻而敏銳。然而，這卻不是孤例，亦非偶然。它反映了當時部份東北知識份子意圖透過境內各種民族的、階級的或者意識形態的合縱連橫，在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及帝國資本覆蓋之縫隙，探尋東北社會出路的渴望。透過其它作家作品，可以看見從初期到後期，滿洲文壇長期存在這麼一個「從他民族觀看，思考自民族」的書寫脈絡。

四、「他者寓言」網絡中的形象工程：新他者與自我願景

在觀看他者、省察自我的書寫脈絡中，「他者」成為一種題材，一個解決「自我」困境的途徑或工具。在特定時代的思考與書寫需求中，「撤退白人」與「底層朝鮮人」，成為由不同背景作家、複數他者故事交織出來的「他者寓言」體系中，最為突出的兩大敘事。在哈爾濱，由於異民族他者之間的社會現象多樣而顯著，因此除了北滿作家之外，其餘不出於北滿作家手筆的類似作品，絕大多數仍以大哈爾濱地區為舞台。

首先，以書寫「撤退白人」的作品為例。在這個以俄國人為主、猶太人居次的多民族國際都市裡，「撤退白人」的書寫以白俄人的書寫最為主要，其次為

²² 在作品中首次出現時，還被作者寫成了「果里列夫」。這個筆誤至今仍保留在重出的各版本中。

猶太人。如前所述，俄人在哈爾濱的發展，以中俄共管鐵道為界，出現第一次撤退潮，1935年北鐵讓售則為俄人撤退的最後一波高峰。在猶太人方面，猶太人為古老的流亡民族，二十世紀歐亞各國戰爭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受到無數傷亡與迫害。中東鐵路起建後，俄國境內的猶太人跟隨白俄勢力進入哈爾濱，1902-03年間哈爾濱出現了猶太人最初的俱樂部、宗教公會、祈禱所和墓地。日俄戰爭爆發，數以萬計的俄國猶太士兵被派往中國東北作戰。以救助和慰問猶太傷兵的運動為中心，哈爾濱猶太人口日益增多，1907年猶太小學成立，1913年人口達俄僑人口的11.5%。一戰期間大批猶太難民湧入，1920年僑居人數攀昇到二萬人之空前高峰，各種商貿團體及國際猶太人組織活躍一時。1922年中蘇共管中東鐵路後，白俄及猶太人口逐年下降。大批北鐵離職之無國籍猶太人於1925年南遷，以此為關鍵，1926年猶太人口減至1367人。此後歷經1935年北鐵讓渡，到1937年中日爆發初期，僅存千餘人左右，此後未再增加。²³如上所述，哈爾濱猶太人的興衰，幾乎與中東鐵路上白俄勢力的起落一致。在1925年以前，崛起於遙遠歐亞大陸東陲的哈爾濱，約莫有二、三十年間為猶太人喘息、發展和避難的空間。

將白俄人作為洋溢異國情調之哈爾濱街頭風景一環，進行的描寫不勝枚舉，然而多屬浮光掠影。以生活在東北的白人故事為主題深入描寫者，則不約而同地集中於他們沒落敗北的一面。1941年爵青發表的〈斯賓塞拉先生〉²⁴，驚鴻一瞥地刻劃了向白俄人租屋，蟄居哈爾濱四年的猶太紳士，遷居上海前夕向中國籍新房客，偶然吐露的一段深不可測的半生傳奇。在兩人嫺熟的英語交談中，40不到卻宛如多年隱遁者般蒼老的斯賓塞拉先生，向記者「我」述說了古老小亞細亞民族的宿命血液，如何在他身上激起種種不幸與對抗不幸的波動。²⁵1943年支援發表的〈白藤花〉²⁶，則描寫曾在北鐵事業巔峰期奢華過日的白俄老夫婦，在30年代日益蹇困的故事。妻子獨居在沒落白俄貴族與中國人雜居的道里區八雜市巷弄，分租住屋藉以糊口，在平淡寂寥的生活中盼望奔波遙

²³ 參見，曲偉、李述笑主編，《猶太人在哈爾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8月），第253-261頁。由於東北地區猶太人及白俄人的流出，1930年代上海出現很多無國籍人士。

²⁴ 原收錄於，爵青，《歐陽家的人們》（長春：藝文書房，1941年12月）。參考，中國現代文學館編，《爵青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年8月），第17-37頁。

²⁵ 17歲時他從希臘流浪到義大利地中海邊從事小買賣，19歲歐戰爆發前因猶太人身份，遭到無端被捕。逃出後投入法國軍隊與前線德軍作戰，在戰爭中看盡各種殘害猶太人的事件。大戰中為法軍經歷幾番出生入死，負傷送進醫院療養時迎接了和平鐘聲，戰後卻貧困潦倒於巴黎街頭。25歲時越過大西洋輾轉到芝加哥、舊金山等地工作，依舊遭受歧視，30歲飄洋過海到上海，35歲旅居哈爾濱，擔任美國花旗銀行外國駐在員。

²⁶ 原發表於《華文大阪每日》10卷1期，1943年1月刊出。收入張毓茂主編，《東北現代文學大系·短篇小說卷(上)》（瀋陽：瀋陽出版社，1996年12月），第357-371頁。

遠異地的丈夫，帶回明日生活的希望。不料丈夫最後潦倒不堪且患了重病歸來，過了不久兩人更因突如其來的不明事件，在夜裡被神秘汽車載走，留下了殘敗的廢園、深鎖的空屋與令人悵惘的謎團。

兩篇小說都透過陌生中國房客之眼，再現東北社會中疏離的「消逝白人」姿影。這些彷彿在無聲中消逝的人們，曾經都是哈爾濱社會叱吒一時的上層階級或活躍者。1930年代中期以後才姍姍離去的白人，落在1925年及1935年兩次北鐵經營權變動引起的白人撤退潮之後。在高峰期過後的消逝，有如離群的孤雁一般，顯得特別的傳奇、孤零乃至神秘，此外還若隱若現透露不可言明的壓力或無奈。在吉光片羽的零星描寫中，作家旁敲側擊地暗指這些敗北、不幸與撤離，仍和新興日本勢力的到來，它對哈爾濱及整個東北社會的主宰有關。

在〈斯賓塞拉先生〉中，爵青藉由無國籍的猶太人之口，指控在戰爭中推演現代史的人類世界，不過「僅僅是個刑具」而已。當猶太人娓娓述說世人如何忽略一戰期間猶太人對和平的貢獻，又如何漠視廣大猶太人受到慘害的事實時，「我」若有所感地起了共鳴。「是的！他們真是世界或人類的受難者，他們拖著不幸的命運，數千年來未曾卸過一次，總是從世界的一隅到世界的一隅，王朝世襲了一代又一代，國家變換了一個又一個，他們處處被卑棄...」。 「我」也因為歎息「他們沒有英雄或偉人，有了也是在二十歲年青的時候便遭了忌妒者的劫殺」，而想起那件令人激憤的哈爾濱知名凶案。1933年8月，巡迴上海、日本演出的青年猶太鋼琴家西蒙·卡斯普，在哈爾濱遭到日本憲兵隊指使的俄匪綁架後遭到殺害，12月猶太社區上萬人參與葬禮。此事引起哈爾濱猶太人高漲的反日、俄法西斯主義情緒，同時激化猶太人與俄國法西斯黨多年來的明爭暗鬥。二戰期間，日本政府對滿洲境內猶太人採取「不公開歡迎，亦不排斥」的政策，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簽訂後日本並未跟隨反猶，但是日、俄法西斯團體對猶太人的干預及迫害不斷。²⁷

〈沒有祖國的孩子〉裡，俄人撤退高峰期裡那充滿戰鬥、希望與民族聯合的片段，在〈斯賓塞拉先生〉及〈白藤花〉裡猶如昨日黃花，已難再現。不過，40年代作家在比1932-1937年統治初期更為隱微的「他者隱喻」中，延展自民族困境的凝視，同時持續間接射擊，批判日本法西斯主義及與連結勢力。藉由哈爾濱境內撤離的白俄人、猶太人，或者流亡民族末裔的反法西斯告白，以此喻彼，仍是東北作家不衰的策略。

其次，介紹有關「底層朝鮮人」的作品。不論1930或1940年代，東北現代文學中的朝鮮人形象，總以弱勢或負面的描寫居多。然而，進一步觀察，則會發現背負消極形象的這些人物，大部份是生活困頓的底層朝鮮人；若非如此，多半也是位居日本帝國階層構造下、「滿洲國」社會組織裡的底層帝國屬民。

譬如，1942年小松的小說〈人絲〉²⁸，即描述中朝國境線上「滿洲國」某

²⁷ 譬如，1939年俄國法西斯代表大會在哈爾濱召開時，便通過決議，抗議「滿洲國」當局幫助猶太難民由歐洲經西伯利亞到中國東北避難。參見，《猶太人在哈爾濱》，第260頁。

稅關緝私科，如何奸滑利用朝鮮告密者，追捕鬻兒賣女鋌而走險的貧困人造絲走私販，並不擇手段中飽私囊的故事。朝鮮人「金」，風雪夜裡從山嶺裡出來告密的十八九歲土民，一個卑微的「影子」。在中國人緝私隊長哄騙下帶路，卻一路遭到見獵心喜、亢奮不已的隊員威脅辱罵。在走私者被一網打盡的「勝利」剎那，他竟意外遭到一頓殘暴毒打。「血染了他自己的衣服。那種淒慘的叫聲，和外面的急風調成沒有節奏的音樂」。歸根究底，那頓虐打不過是緝私員意圖浮報巨額住院費，加以私吞的慣技而已。「金」，如獵犬般帶路，最後未獲論功行賞，反而以受害的肉體遭到第二次利用，其地位甚至不如一條狗。

隸屬日本軍隊、「滿洲國」政府組織或其餘機構，比底層農民「金」有較好社會處境，但同樣站在「滿洲國協力者」位置的朝鮮人，則以羅烽〈滿洲的囚徒〉²⁹、〈呼蘭河邊〉³⁰的朝鮮人角色，最具代表性。1934年羅烽以被拘捕於哈爾濱日本帝國領事館扣留所的經驗，寫成了〈滿洲的囚徒〉。小說裡描寫了一個雜處在中、俄政治犯中，名叫「朴廣元」的可疑獄友。經歷幾番風波後，「我看清楚朴廣元本來的面目了；他是一個骯髒無恥的人，他是一條拙笨的獵犬，現在，我完全證明他是個被敵人利誘的叛徒，而負著監視我、轉變我的使命的」³¹對比於這位被派往政治犯中間進行心理攻防與證據蒐集的朝鮮密探，小說中另外塑造了落難獄中卻時時照拂貧弱、為病友抗爭人權的蘇聯公民「卡布欽斯基」。³²在「十月革命節」裡，中蘇不同國籍、信念相通的獄友相濡以沫，暗暗唱著「國際歌」，「這個凍死人的冰牢，彷彿頓時射進澳洲的陽光。凍結的空氣，凍結的血，以及凍結的神經。全在那種強烈的熱度之下溶解了。」³³羅烽筆下，覆蓋在日本人陰影下的朝鮮人形象，與向中國輸出紅色革命的蘇聯志士形象相比，可謂判若雲泥。

1935年撰寫、1936年發表的〈呼蘭河畔〉，羅烽則以駐守哈爾濱市郊呼蘭河鐵橋上日本鐵道守備隊對中國百姓的茶毒為主軸，諷刺日軍武勇外相下虛有

28 原作於1934年，1934.6.18被捕後中斷寫作。首次發表連載於1938.3.20-6.5《戰地》半月刊。

後收錄於短篇小說集《人和人們》(長春：藝文書房，1942年1月)，後收於《東北現代文學大系·短篇小說卷(上)》，第327-337頁。

29 羅烽，〈滿洲的囚徒〉，收於《羅烽文集5：未了篇》(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162頁。

30 原載《光明》1卷2期，1936年6月，後收於《呼蘭河邊》(上海：北新書局，1937年8月，初版)。

31 引自，《羅烽文集5：未了篇》，第62頁。

32 小說中寫道，「我略微睜開眼睛，首先我看見卡布欽斯基身上的“賓夾克”不見了。他僅穿著一件比我的上衣更顯得單薄的工作襯衫。然而那件暖和的皮外套卻蓋在我的身上。這種罕有的溫情，使我的眼窩突然濕潤起來。」同上註，第146頁。

33 同上註，第150頁。

其表的貪婪怯懦本質。位置險要安穩無虞的守備隊，因「遠處飄過來的洋炮聲」受到驚嚇，在繪聲繪影中無法無天地，拘捕並殺害了誤闖禁區的無辜牧童，並棄屍於荒野。作為貧農重要財產的牛，也被吞進了貪婪士兵的五臟廟裡。在一夜哀嚎不斷的拷問中，擔任威嚇和翻譯工作的，則是守備隊裡的翻譯兵朝鮮人「李得浩」。不論「金」、「朴廣元」或「李得浩」，都是情節鋪陳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即使不特別賦予朝鮮人身份對情節推展亦無大礙。然而，作家卻以朝鮮人隸屬日本帝國利益共同體的視野，將背負多層次民族矛盾的負面形象，交由朝鮮人角色來承擔。

「撤退白人」及「底層朝鮮人」兩種敘事，無一不體現「滿洲國」境內緊張的民族關係與反日情緒。蘇聯放棄沙俄在華利權，博得了中國人民好感。相較於崇俄親蘇心理，仇日氣氛日益高漲，連帶也帶動了排朝效應。〈沒有祖國的孩子〉中的滿洲他者敘事，並未脫離這樣一個社會歷史脈絡，它浮現在當時知識份子對民族侵略問題的焦躁思考中。然而，其重要性在於它以文學的藝術形式對這個時代議題，進行了高度的囊括性。故事裡撤退的東鐵學校師生，屬於「撤退白人」物語；果里兄弟，則為「底層朝鮮人」故事。而且不論哪一個主題，〈沒有祖國的孩子〉，都試圖穿越民族表層利害，挑戰既有的他者成見，對驕傲的中產階級沒落白俄末裔、革命女教師蘇多瓦、少年志士果里、朝鮮「無產階級」「老鼠」「走狗」「志士」，進行階級屬性與社會形象的區隔，因此堪稱「滿洲他者」書寫的先驅。

它的先驅性價值，除了來自此一時代議題的較早提出之外，還在於它在最大層面上，表現了超越性的思考，同時進行了中國人對俄人、韓人普遍成見的商榷與打破。與它同時期探觸「滿洲他者」的其餘作品，往往僅能處理其中一、兩面向，罕能同樣細緻地分析他者形象的分歧並進行再造。羅烽善以異民族角色的添加，突出民族矛盾議題上的張力。然而，在他批判日本的作品中，同時也意圖反映東北人對「在滿朝鮮人」抱持敵意與排斥情緒的一面，因此他的朝鮮人角色設計，仍偏向固著和消極的一面。羅烽之外，同屬北滿作家的蕭軍則有不同的突破。他於1934年流亡途中完成的《八月的鄉村》，被魯迅讚賞為「莊嚴的工作」³⁴，1935年由上海奴隸出版社推出，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首先反映武裝反抗日本侵略者鬥爭」的作品。在這本以粗獷豪放的東北風格，提供了全新文學內容和表現形式³⁵，並為東北作家群在關內文壇打開名號的「開山之作」裡，難得一見地出現了對朝鮮人角色的積極設計。

34 出自魯迅為該書所作〈序言〉，魯迅藉此批判關內無視國難當前的各種「荒淫與無恥」現象。收於中國現代文學館編，《蕭軍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年8月），第169-170頁。

35 相關評價，參見白長青主編，《遼寧文學史》（瀋陽：遼海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上冊，第169-171頁。

蕭軍透過東北人民革命軍在磐石一帶和日本侵略軍的浴血戰鬥，塑造了東北作家筆下前所未有的異國英雄，朝鮮女志士—「安娜」。安娜出生上海朝鮮獨立運動志士之家，14歲開始受父親訓練，花樣年華便懷抱父親指示，派往滿洲山區參加革命軍。「只要全世界上無產階級的革命全爆發起來，我們的祖國就可以得救了。安娜！到滿洲去吧！」³⁶安娜在軍中負責文書、醫療與精神教育，親切救護並教導農民出身的同志們。「為什麼要革命？」、「為什麼當前非得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打跑不可？」，她一遍遍深入淺出地宣說中國農民是世界被壓迫階級之一，「日本人一定比處置朝鮮人還要厲害，來處理滿洲的民眾」等等。³⁷蕭軍曾在早期小說〈下等人〉裡，描寫隱遁滿洲的跛腳高加索酒館老闆，庇護遭受哈爾濱警署官員壓迫的中俄勞工之故事。³⁸流亡時期，他的小說開始從所偏愛的中俄無產階級聯合敘事，擴大發展出與日本帝國不同的另一種「滿鮮共同體」敘事。「安娜」所象徵的中朝民族的跨民族合作，與舒群筆下中／俄／朝被壓迫民族的聯合，傳達著相近的思考。但是說著一口流利中國話的「安娜」，越過了以俄語為共同語的中、朝少年交流障礙。相較於「東北境內」弱勢民族間的相互同情，以中青階層紅軍為主體，上海都市連接東北鄉村，「中國境內」革命勢力的南北串連，也比踏入關內即遭到扼殺的「少年志士」之路，更明顯地把「跨民族聯合之東北抗日敘事」，推上更高樓層。從弱小民族的相互扶助到弱小民族的革命聯合，從東北人抗日敘事擴大到全國抗日敘事，東北流亡作家的小說對關內抗日敘事起著推波助瀾的效用。在此過程中，朝鮮人形象也從中國人旁觀或俯看的消極角色裡，躍昇為奔流著朝鮮獨立志士血統，「休戚與共」與中國人平等並肩作戰的優秀同志。

研究者金昌鎬指出，滿洲事變後韓人形象作品多由東北作家群和東北淪陷區作家創作，數量大增，遠超過此前十多年的創作。而且表現範圍擴大，除了早期偏重的貴族、共產黨員之外，也拓展到了流浪兒、農民、工人、走私者，甚至流氓惡霸。³⁹逢增玉則把東北作家書寫的韓人形象分為「與東北人民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朝鮮革命者或抗日英雄形象」、「飽受亡國之痛而流亡到東北的朝鮮普通人形象」、「與日本殖民當局有關係或受日本人指使的朝鮮人形象」三大類。⁴⁰〈沒有祖國的孩子〉與〈八月的鄉村〉，同樣起筆於1933年哈爾濱，完成於1934年青島。舒群、蕭軍對朝鮮人形象的再造與突破，顯示北滿

³⁶ 引自，蕭軍，〈八月的鄉村〉，收於《蕭軍代表作》，第94頁。

³⁷ 同上註，第84頁。

³⁸ 收錄於三郎、悄吟，《跋涉》（哈爾濱：五日印畫社出版，1933年10月），第117-140頁。

³⁹ 參見，金昌鎬，〈苦難的歲月，互補的文學——淪陷時期中國東北與韓國文學比較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2003年10月），第94頁。

⁴⁰ 參見，逢增玉，《黑土地文化與東北作家群》（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2刷），第174-175頁。

作家群在對他者議題的長期探觸及形象塑造的經驗累積中，逐漸突破固著成見，廣泛反應中日衝突白熱化後，東北知識份子面對國家困境與民族矛盾問題的靈活思考。從「金」、「朴廣元」、「李得浩」，到「果里」，而後到安娜，東北文學中的朝鮮人形象，確實因為東北淪陷的切膚之痛，使中國人對於前車之鑑的朝鮮民族命運，在「自我投射」、「自我警惕」的同時，提昇了正面的同情和理解。然而，相較羅烽筆下哈爾濱監獄裡一身傲骨、令人尊敬的「卡布欽斯基」，或者蕭軍筆下深沈幹練、深藏領袖魅力的高加索老闆，以少年或女性被塑出來的新朝鮮人形象，在偉岸、老成、深邃的堂堂俄國志士面前，仍不免顯得柔弱矮小。

然而，這一切畢竟是歷史現實與形象工程交互作用的結果。它反映了一定的歷史現場中的民族關係，反映了當時東北人親蘇排日的情緒，更反映了、或者說隱藏了東北淪陷後中國人的恐慌與焦灼。

結論—形象工程的變形與置換

二十世紀前期的哈爾濱與中東鐵路，是北滿作家群匠心獨具的選擇。舒群對主權淪喪採取間接化的描述，對東北人的恐懼與焦慮的再現，同樣也是間接的。作家將對自民族的剖析，隱藏到對「次要他者」的書寫之中，藉由次要他者對「主要他者」的觀點，隱藏並抒發自己對日本帝國激烈而複雜的情緒，並在自我與主、次他者的隱喻之網中，省思國際現實中的國族未來。北鐵所象徵的帝國主義侵略及民族矛盾，以及哈爾濱眾多滿洲他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成為他們編織「他者寓言」的最佳舞台。在這個舞台上，日本人、朝鮮人、白俄、紅俄、猶太人一一登場，代替「滿洲國」裡無法快意暢言的中國作家，展演一幕幕東北人的苦難與盼望。

在東北，基於被殖民因素以及現實利害關係，在一般日人、俄人，或者中國人面前，在滿朝鮮人常是被排斥者或弱勢者。這樣的認知烙印在文學作品裡，反映了部份現實，卻又不完全真實。隨同滿洲占領而在東北活躍的朝鮮人，不一定比中國人弱勢；而被迫臣屬帝國結構底下的朝鮮人，也未必都是日帝的扈從者或受益者。在滿朝鮮人刻板、消極的集體形象，於主權旁落的1930年代，逐漸由於北滿作家的凝視獲得重審。〈沒有祖國的孩子〉，透過中國少年的眼睛，從俄人、中國人的「朝鮮成見」中突圍而出，在階層化的民族關係中，指出民族關係中應當被跨越的階級矛盾，創造出一個從日本統治體系掙脫出來，兼具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新朝鮮人形象，其中實隱含了深刻的中國人之自我投射。從東北人率先經驗淪亡到中國全面抗戰情勢升高的變化中，蕭軍等其餘東北流亡作家的書寫，繼續使朝鮮人形象在中／朝聯合抗日的跨民族合作想像裡，達成前所未有的突破。

然而，根據舒群少年時期一段異民族情誼寫成的這篇小說，其實經過了形

象的變形與置換。在真實的故事裡，「果里」不是朝鮮抗日份子後裔，是俄國雇用的朝鮮籍北滿職工小孩。當自幼貧寒的舒群繳不起伙食費遭退學時，由於果里的居中努力，才使得舒群受到蘇聯女教師「周雲謝克列娃」協助，進入紅俄中學繼續學業，並在女教師引導下獲得國際主義精神的啟蒙。⁴¹換言之，關切、同情並照拂著中國人的，是朝鮮人；而現實中最弱小的一方，其實是正值風雲變色、處境艱難的東北人。因此，與其說文學中的朝鮮人形象消極弱勢，不如說他是在極度不安的東北人集體精神結構裡誕生的自我隱喻。如果說朝鮮人是最接近東北人現狀及往後命運的他者；那麼，突破弱者形象的朝鮮人，則是往抗日路途中掙扎、亟欲站起來的新中國自我。猶太人是淪亡者顛簸惕勵的警鐘，至於濟弱扶傾的蘇聯人，則是民族國家的未來願景。

在變動時代的哈爾濱，「滿洲他者」形成的國際想像與寓言網絡裡，我們看見各民族形象在整體東北人他者形象網絡中的位置與意義，也看見經由東北人視野傳達出來的現代中國的隱憂、恐懼與突圍之道。出於深刻的身體經驗與歷史苦難，東北作家對於受壓迫民族及階級攜手合作的期待如此殷切。然而，迫於各國內部及國際之間的政治動盪與民族矛盾，抵達這個樂觀想像與共同願望的道路佈滿荊棘，至今依舊如此漫長。

參考書目

- 三郎、悄吟，《跋涉》，哈爾濱：五日印畫社出版，1933年10月。
- 羅烽，《橫渡》，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8月。
- 遼寧社科院文學所、黑龍江社科院文學所編，《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二輯，1980年4月。
- 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三輯，1981年4月。
- 孔經緯、朱顯平，《帝俄對哈爾濱一帶的經濟掠奪》，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
- (日)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譯，《滿洲國史》，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校辦印刷廠，1990年12月。
- 蘇崇民，《滿鐵史》，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12月。
- 羅烽，《羅烽文集5：未了篇》，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
- 張毓茂主編，《東北現代文學大系·短篇小說卷(上)》，瀋陽：瀋陽出版社，1996年12月。
- 逢增玉，《黑土地文化與東北作家群》，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

⁴¹參見，〈舒群和他的第一個老師〉，第16-18頁。

月。

中國現代文學館編，《舒群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年1月。

中國現代文學館編，《爵青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年8月。

中國現代文學館編，《蕭軍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年8月。

曲偉、李述笑主編，《猶太人在哈爾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8月。

金昌鎬，〈苦難的歲月，互補的文學——淪陷時期中國東北與韓國文學比較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2003年10月。

白長青主編，《遼寧文學史》，瀋陽：遼海出版社，2005年7月。